

◎创作谈

# 小说的种子如何生根发芽？

胡学文



多年写作，每有闪念，我会马上记下，身边有纸笔当然好，没有便记在手机上，再转记到纸上。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文字到了纸上，就如种子植入大地，不但可以生根，还会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长，且无需担心被窃。不是什么秘密，习惯而已。之所以说是闪念，因为常常来得极快极突然，有时持续久一些，有时稍纵即逝。清早急步，旅行途中，酒酣之际，半夜梦醒，读书期间，被某种情绪淹没时，没有确定的节点，可遇而不可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感，但我不敢这么定义。奇妙的灵感应属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样的世界级大师。于我，称为写作的种子更为恰当。所谓种子，形状各异，一个词、一句话、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一段梦境，而记述有繁有简。并非所有的种子都发芽，有一些在彼时兴奋不已，但一年或数年之后，就演变成石子，暗淡无光。另一些，被他者“捷足先登”，发现有作家写过类似作品，写作的劲就不足了。勉强写出，或有抄袭之嫌。从另一个角度说，若别的作家也能想到，那就算不上是奇思妙想。这样的种子最终会被抛弃。

我有一个专用记述闪念或种子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几近杂乱。里面的多半种子都生根发芽了，有长篇，如《有生》，有中短篇，如《从正午开始的黄昏》《风止步》《龙门》《奔逃的月光》《三月的秋天》等。即便发芽，也不是一蹴而就，种子生长得极为缓慢，特别是长篇。其过程是先由纸入脑，再由脑入心。入脑阶段，小说的题目、叙述方式、视角、人物（包括名字、性格、彼此关系）、结尾等大致有谱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便是激情和动力，有它们才能由脑入心。也可以说，一旦入心，便有了写作的冲动。部分情节和细节也是揣于心间的，而相当一部

## 开启世界文学阅读奇妙之旅——评徐则臣《寻找理想作家》

施展

徐则臣在《寻找理想作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表现出一位文学家的审美品位和非凡见地。本书是由阅读史、作家论、书序、演讲等组成的文论集。从阅读史出发，作者一路品评卡夫卡、卡达莱、厄普代克、奥尔罕·帕慕克等作家的经典名著，以作家的感知、编辑的眼光与丰沛的体悟，探索文学创作上的独特发现。

《寻找理想作家》是一场文学行旅和精神漫游，以作家作品论为中心，徐则臣讲述中国文学从传统和现代中走来的历史脉络，描绘中国与世界交错互动的文化图景，展望并想象中外文学的未来走向。开篇《我的“外国文学”之路》中，徐则臣沿着有迹可循的思想轨迹，漫谈当年“为阅读而阅读”的纯粹兴致，分享如“饥饿之人喝到狼奶”般汲取外国文学滋养的过往。在文学之路上，他数次重返曾经读过的经典作品，从生活所感与创作所得出发，实时更新并重建人与小说、世界的有机关联。如果说，阅读的习惯是文学向生活的自然延伸，那么重读的姿态更意味着一个人在时间的洪流中，向内安置自我。

面对海量世界文学经典，我们常常习焉不察，忽略了文学的真谛

需要百转千回的品读回味。一位作家赋予同一故事的不同结局（《大江健三郎的审判》）、一次窄门的前后穿越（《当我走过窄门》）、一对夜行父子的对话（《你没有听到狗叫吗？》）……其中深藏太多秘密。对于这些作品，徐则臣浅入深出地切入小说肌理和故事语境，着眼作品细节和作家观念，赏析故事内外的艺术魅力。在他看来，每一位大师级作家的小说，皆蕴含某种独特的人性与文化命题，尽管世殊时异，也不乏供后来者静心体悟的新意。人与经典的相遇或早或晚，真正地理解往往要经历岁月的沉淀。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为世界文学的阅读提供了一种生动、有力、凝练的读法。《只有一个马尔克斯》从马尔克斯去世的追悼，谈到他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在于“每一位作家遇到马尔克斯，相当于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发现了一种新的想象和表达世界的方式”。《寻找卡达莱》认为，卡达莱的创作优长在于“阿尔巴尼亚历史与社会主义经验的个人化的文学处理”，他与中国作家分享着类似的历史处境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徐则臣对小说结构和艺术形式的精彩见解，更彰显出一位作家直面复杂文本的才华和鉴

于心田，我将写出一部因情而生的作品。意识到“受孕”是后来了。说实话，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更不是我计划的，如果可以选择，如果能避开那一刀，我绝对会舍弃这部小说。但我不能选，既然“怀”上，就“生”下来，这是我能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

何时“分娩”？我不知道。就像哪吒的母亲殷夫人并不清楚她怀胎三年六个月后才生下哪吒一样，我亦不能推算。我能做的就是等待。那时，我刚开始《有生》的写作，以为《有生》杀青，怎么也可以“生”了，事实是并没有，虽然我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就像许多母亲那样，婴儿衣服都做了几套了。倒是不急，时常感觉到“胎动”，倒也甜蜜。

2021年春夏之交，工作调动，我迁至南京生活。已“孕”十年，尚无“生产”迹象，我以为还要许多年。我构思了一部长篇，案头工作等着我，费时，也需专心。

2022年伊始的一天，晨起，因天气缘故，我未能如往常一样下楼快走，便坐于桌前，凝望雪雨飘落。天色尚暗，屋内昏昏。我如一个迷途者，难辨方向，只是没有迷路的慌乱。脑无杂念，心静如水，那是一种与茫茫大地融为一体、突然接通了什么的感受。疼痛突至，仿佛即将“分娩”的讯号，我既惊又喜。以为还要数年，没想到突如其来。那就“生”吧，与此同时，小说的第一句话也浮于脑海。首句关乎叙述方式，也关乎叙述腔调，因而至关重要，完全凭感觉、靠气息。在此之前我没想过，可以说，这是另一重惊喜。我说过，这是一部为情而生的小说，我没想到那么多，只想让它“呱呱坠地”。

但铺开稿纸，我不得不进行思考或者说探寻。没错，我是为情而作，不必硬性地、牵强地将某些人尽皆知的“意义”“主题”充塞于字里行间。可我写的终究是小说，不是生活的展览，不能任凭故事的洪水汹涌席卷一切。我得让地和他，让她们和他们立于波涛之上，我要追寻人物的人生轨迹，破解命运的谜题。我能看清他（她）们，能看到他（她）们站在起点，达至终点的样子，但其行进的路，于我是模糊、费解的，而追寻和破译，也是激情的一部分或动力所在。

我想到了几个词，文化、时代、环境、性格、基因，以及难以用语言定义的神秘和奇诡，它们如何合奏、如何分工、如何协作，让一个人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人物又是如何与它们有意识无意识地较

量的？从某个角度讲，小说呈现的是破译、破解过程。上述词汇，不过是确定大致方向。

作品完成，作家应该消隐，尤其于文本的解读，是不该多言的。关于其他，倒是可以多谈。比如写作准备和写作习惯。有人夜半，有人晨起，我基本是下午写作。写《龙凤歌》时，有几个月是凌晨加午后。每日写作时间久，即便精力跟得上，激情也难以持续，所以写了一段，就回到之前的习惯。而那一个从夜色初褪至艳阳高照的日子，独坐桌前，神游天地，回忆起来倒也甜蜜。

一位作家朋友讲，有了开头的一句话，就可以落笔，不考虑其他。技术在身，有信心有雄心，当然没问题。我难以如此，需要很多准备，尤其是长篇。即使《龙凤歌》这样如同血肉的小说也是，甚至还要给人物写一个简单的的小传。窃以为，长篇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结构的艺术，结构有隐有显，像略萨的《绿房子》《公羊的节日》偏于显性，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偏于隐性，命运即结构。两者没有高下之分，不过是艺术追求的差别。

小说的题目很重要，特别、响亮、有味道，可为小说增色。我不是特别会给小说起名字，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刊物编辑、主编改换的。如中篇《背叛》《苦水潭》《飞翔的女人》，皆为《人民文学》改定，《跳鲤》《龙门》则是《花城》改的。《有生》初始题目是《生死镜》，发给《钟山》时改为《万物生》，主编贾梦玮认为不妥，列了《有生》《天地大德》两个题目让我选，我选了《有生》。他回说也中意这个，算是不谋而合。回首再看，《有生》确实是最合适的。《龙凤歌》原来的题目是《龙凤图》，贾梦玮认为图字缺少动感，遂将“图”改为“歌”。

写作是冒险的旅程，沉于其中，多觉其喜其乐，完成后却是不安的。《有生》发于贾梦玮信箱，我的心基本半悬着，春节期间，收到他的信息，说刚看了几十页，但感觉这是一部大著，嘱我先不要给别人看。贾梦玮办刊多年，个人也写作，眼光独具，他如此言，我当然欣喜。《龙凤歌》也是先发给他的，他没用“大作”冠之，回言“特别”，这正是我期中的，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作家的愿望，每部都与上部有所不同。如果要我言说已近花甲之龄的梦想，那就是数年之后，再产一个特别的孩子。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爱意从书中穿越出来，仿佛治愈了小小的我。”“女性视角的讲述，既细腻又绵长。”“读的时候脑子里充满了画面感，好多次掉眼泪，因为情真意切。”这是豆瓣上，读者对《明亮的夜晚》的评价，约有4万人打分或留言，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明亮的夜晚》是韩国80后女作家崔恩荣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在横跨百年的时间中讲述了从曾祖母、祖母到妈妈和“我”四代女性的人生经历和情感故事，经磨铁图书引进后受到中国读者欢迎。不久前，崔恩荣到访北京，在6天时间里举办多场读者见面会，现场座无虚席，读者热情高涨。

“上一次来中国已是14年前的事了。这次来北京，日后回忆起来，可能会想到‘春天’这个词。比如春天的阳光，还有我遇到的人，都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会记住这种温暖。”崔恩荣说。在密集行程间隙，本报记者与崔恩荣围绕她的成长经历及创作感悟进行了交流。

崔恩荣1984年出生于韩国京畿道光明市，高丽大学国文系毕业。2013年走上创作之路，十余年时间里她已斩获诸多文学奖项，并凭借代表作《祥子的微笑》《对我无害之人》《明亮的夜晚》等，成为韩国乃至世界知名的青年小说家。

“以前写作，我是把它当成一种兴趣，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有写作天赋。我的性格和《明亮的夜晚》中的主人公智妍很像，总是在适应着这个世界，而且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平常喜欢读书，喜欢做一些安静的事情，在感情上比较多愁善感。”崔恩荣说。小时候，她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公司职员，毕业后，她做过一段时间韩语讲师，直到开始写作，她重新认识到内心对想象和表达的渴望，甚至“睡觉的时候都会想起写作这件事”。

大学期间，崔恩荣阅读了申京淑、孔枝泳、殷熙耕、金爱烂、韩江等大量韩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尝试通过女性视角观察世界。在《明亮的夜晚》中，作家将故事的主体放在同一家族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代女性身上，塑造了曾祖母、新雨大婶、祖母、喜子、妈妈、“我”（智妍）等鲜活的女性形象。女性长辈在战争年代的互助、祖母与“我”跨代际的心灵相通，“我”与母亲亲密关系中的冲突与和解，写出了女性内心世界的百转千回，绵密而细腻，深具打动人心的力量。

在崔恩荣这里，题材反而没那么重要，她更在乎的是如何讲故事。“比如有作家会预先设定写劳工问题，可能我作品的主题也是劳工问题，但我一般不会直接从正面写，而是会从女性视角去看、去表述”。《明亮的夜晚》中，作家关注历史之下人的命运轨迹如何偏转，身处时代风云中如何安放身心。崔恩荣说：“我喜欢通过历史事件对周围人的影响来描写这个事件，我在写作过程中尽可能不去教读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也不会把自己的感受强加给读者，我希望读者读我的作品能感受到其中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存在的真实很多时候体现在小说的细节中，比如开篇对智妍遭遇婚变后的一段心理描写：“如果心是一个可以从人体中取出的器官，我想把手伸进胸膛，把它取出来。我要用

## 韩国作家崔恩荣：探索东亚女性心灵世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温水将它洗干净，用毛巾擦干水汽，晾到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直到我的心被晾干，了，软软的，重新散发出好闻的香气，再把它重新装回胸膛。”这段话形象地写出了主人公渴望自愈、希望重启生活的心理。如何找到恰当的话语方式，表现人物内心隐曲微妙的感受？在崔恩荣看来，细节与日常紧密相关。她说：“其实我写的就是一些内心的真实想法，平常洗衣服、晒衣服时，我偶尔会冒出‘洗心’这样的念头，于是就那么写下来了。”与一般人对日常生活的习焉不察相比，崔恩荣称她有一种独特的“体质”：“对过去发生的事或经历过的事，我经常会有一种历历在目的感觉。其实有时候想把它忘记，但在某个时间突然想起来的时候，却连很细小的地方都能一同回忆起来，有时这对我造成困扰，但对写作会是一种帮助。”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说：“讲故事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的确，记忆与印象是作家无可替代的写作资源。当记忆的闸门打开，想象的翅膀腾飞，写作对于崔恩荣来说就变成了一种自然的涌动。“我只是把脑海中想的东西写下来，而不会刻意去想小说的构造是什么样的，人物是什么样的。我写作并不是花很大的力气去硬写。”

与崔恩荣交流，能感到她的含蓄、内敛以及对文学和世界的敬畏，尽管她时时在小说中让主人公的内心卷起风暴。《明亮的夜晚》结尾提到，即使从出生开始，用五种感官记录人生的所有瞬间，甚至无数的想法和感情，刻录这些数据的光盘也无法拥有和人生同样的容量，因为人的生命中总是有“不可测量的部分”。在她看来，某种程度上，文学就是对人“不可测量的部分”的探寻。“人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宇宙，不论是物理性的也好，心理性的也要。我们对人的认识，未知的比已知的更多，文学正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它告诉大家，人其实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近年来，随着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韩国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赵南柱、赵海珍、权汝宣等人的作品也相继被翻译出版。对此，崔恩荣认为，两国文化的共通性，是作品引发中国读者共鸣的原因。“中韩文化圈是相通的，我们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虽然我与中国读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我们之间的一些情感是相似的，交流沟通的方式也很相似。”崔恩荣说。她也会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最近正在读刘慈欣的《三体》。谈及未来，她希望即将由磨铁推出的《即使以最微弱的光》中译本能够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受。“这本书收录了我5年期间写的7篇中短篇小说，里面的故事比较多样，推荐给大家”。

与会专家对于可训小说创作及学者小说等相关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大家认为，於可训的小说喜怒不形于色，爱恨藏于平淡。他用中国笔法写地方故事，打破文体界限，记录了个体命运与社会变迁，寄寓着对文学创作未来的思考。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读出“聊斋味道”，能看出他对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传统的自觉吸纳与继承，其作品接通了中国文学传统。

於可训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用饱含深情与诗意的语言诉说了自己转向创作之后，如何翻检记忆、反刍人生，如何选择文体、斟酌词句。他表示，文学要写感情、感情。作家不要忙着去收集资料，不要迷信概念、理论，重要的是找感觉。未来自己将把心安放于小说创作，一直坚持下去。

### 武汉大学举办於可训小说创作研讨会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於可训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办。活动由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承办，《新文学评论》编辑部协办，来自数十所科研机构、高校和媒体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於可训是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与文艺理论家，曾出版《於可训文集》10卷。近年来，於可训投身文学创作领域，出版小说集《乡野传奇集》《才女夏嫫》《鱼庐记》《祝先生的爱情》《渔人故事集》5部。其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自觉追求中国气派，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个人风格。以於可训等人为代表的评论家“跨界”从事文学创作，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坛的一个新现象。